

“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

——兼论外交哲学的作用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院 教务科研处, 北京 100091)

[摘要]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体现。它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天赋使命”意识对美国外交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美国外交; 天赋使命; 外交哲学

[中图分类号] D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2)02-0003-07

外交哲学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功能性因素。它不仅体现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与外交行为中,而且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政治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催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又催生不同的外交哲学理念,从而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可将外交哲学定位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有长期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思想或基本的价值判断。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美国外交的重要功能性因素。它是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体现。“天赋使命”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

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认为在外交方面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天赋使命”意识对美国外交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天赋使命”的内涵

当第一批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时,固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宿命论便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神圣计划”结合起来,播下了美国“天赋使命观”的最早种子。“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希望之乡”(The Promised Land)等,便是他们在尘世履行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的一种表述。

“天赋使命”,首先体现为美国政治家身上强烈的“使命感”或“责任感”。这可从许多美国政治家的有关言论中窥见一斑。例如,威尔逊总统1919年宣

称：“我比其他任何人更相信美国的使命，我认为，她有一种精神能量，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用此来使人类获得解放。……美国享有完成其使命和拯救世界的无限特权。”^{[1] (P.16)}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沃尔特·W·罗斯托说，美国人不应该“放弃我们的使命。我们是整个地球上国家独立和人类自由原则的受托人，打开我们的历史，这是一种自豪而自然的责任”。^{[2] (P.53)}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乔治·布什总统宣称，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维护世界和平，且是这个地球上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唯一民族。2001年8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在国会讲话时认为，不管是好是坏，美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稳定和秩序的重要保证，这是一种可以修正但无法逃避的责任。尽管这些美国政治家们的言论未必就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却充分折射出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天赋使命”意识。用英国学者吉尔·伦德斯塔德的话来说，“美国人传统上视自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个独特民族，其他国家只有利益，而美国却肩负责任。”^{[3] (P.11)}

其次，“天赋使命”还被表述为一种无私的“利他主义”。美国学者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指出：“美国人把自己看做是独特的，受到上帝的恩惠，拥有崇高的理想，注定大功告成。此外，他们还认为通过积极手段在全球传播自由是他们的特殊责任，并以这种方法努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一个道义模式。”^{[4] (P.186)} 这番话反映出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即美国认为作为上帝选定的国家，对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自由、人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是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国政府也常常对此津津乐道，许多美国人也由此感到光荣自豪。另一位美国学者斯特林·约翰逊在谈到美国使命观时也指出：“从历史上讲，美国人拥有这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认为，美国的理想信念不仅对美国是正确的，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因此，为了使美国的命运得到延续，要么是劝告，要么是强迫弱国接受这些信条，文明由此带给了非文明国家。”^{[5] (P.5)}

除学者外，许多美国政治家也竭力强调这种“利他主义”的天赋使命观。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写道：“我们一些领导人认为由于我们德操高尚，所以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公正和正义方面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6] (P.6-7)} 许多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宣称，人类“神圣之火”的持续系于美国人民进行的试验。约翰·亚当斯总统宣称，人们总是把“具有尊严和奇迹的北美殖民地看作是在天意运作下开始的一项宏伟的计划与设计，以启示其他无知者和解放整个地球上其他被奴役的人类”。^{[7] (P.11)} 杰斐逊总统也认为，“美国将通过纯洁和完善的范例，成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避难所，从而最好地服务于人类”。麦迪逊总统进而说：“如果我们国家自身处理得当，将成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对非文明世界的贡献都更大。”^{[7] (P.859)} 1899年威廉·麦金莱总统对一个卫理公会组织说，他做出要西班牙割让菲律宾群岛的决定是为了菲律宾群岛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履行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使命。他说，他不止一夜地跪在地上祈求万能的上帝给他启示和指引，当时他有三种选择，一是归还给西班牙，二是留给美国的东方竞争者，三是菲律宾独立，但都不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留给我们的别无任何选择，只有把它们全部占领，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教”。^{[8] (P.110-111)} 与此类似，其后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为干涉墨西哥事务辩护时说：“我的理想是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正义政府，我的热情是为了该共和国底层的85%的人民。”^{[9] (P.516)} 类似这样动人的、“无私”的语言在其他美国政治家的讲话和政府文告中俯拾皆是。例如，在美墨战争前后，有些美国政治家就把侵略墨西哥说成是帮助墨西哥人脱离苦海，或者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们宣称：墨西哥战争开始了“使这个大陆美国化的命运和使命……宝剑是伟大的文明的传播者，它为商业、教育、宗教以及一切道德和人道的和谐的影响扫清了道

路”。1848年1月,纽约州民主党会议表示:“我们占领它(墨西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10] (P.50)}直到今天,这种“利他主义”的观点依然盛行,几乎每个新总统就职时,都要提到这个主题。例如,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就职演说中多次提到美国所从事的是全人类的希望事业,他说:“(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像风中的种子,带给每个民族,在我们的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我们不会独占,而会竭力让大家分享。民主,我们将铭记于心并且不断传播。225年过去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1] (P.3)}

二、“天赋使命”的渊源与变迁

“天赋使命”虽是美国外交哲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实际上,“天赋使命”意识发轫于人类文明形成的初期,早在很久以前就成为某些先进民族为证明其对落后民族统治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例如,古代希伯莱人宣称,他们是一个神圣的民族,是被上帝选择为统治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一个特殊民族。

美国外交哲学理念中的“天赋使命”意识,滥觞于新教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北美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随后又得到世界上发端较早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加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神学理论体系——新教。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基督教新教义是其中主要理论体系之一。加尔文教派主张上帝以绝对的最高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其他的则成为弃民。个人的得救与否,富贵与贫贱,皆早由“上帝选定”。一般基督教教义往往导致宿命论,但宿命论在新教伦理中并非完全起消极作用。因为根据新教教义,人们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以通过在尘世中的积极行为来赢得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认识强烈引发了新教徒在尘世的天职观,也就是说新教徒认为他们是以聆听上帝的召唤,作为“上帝选民”来到世

间的,因此,对热衷宗教的人来说,改造世界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按照禁欲理想改变世界的义务。清教的这种价值趋向便是美国的“天赋使命”意识得以滥觞的最基本理论前提。

清教徒拯救世界的“理想”随着北美大陆的开拓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的主要内容也得到一些宗教领袖的系统阐述。如18世纪上半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就认为北美的发现和开拓是上帝的旨意,其目的就是想创建一个全新世界。他把北美大陆的发现说成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照此逻辑推理,北美的发现乃是一种神圣力量的体现,而北美的昌盛也无疑有助于上帝事业的完成,正是在这里,“上帝将要开始对地球上可居住的地区进行变形更新,即以—种激进的新的宇宙秩序为标志的更新。……因此,美国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12] (P.47)}美国文化中的这种宗教价值趋向深深影响了美利坚民族思想的形成,在思想意识上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灵魂”。虽然早期移民还没有把自己享有的自由推及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念,但新大陆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性以及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承担的特殊使命。“拯救”和“使命”意识融进了美利坚民族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19世纪,“天赋使命”意识表达得更为直白,即“天定命运”理论的出现。“天定命运”作为名词使用始见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1845年夏,美国杂志《民主评论》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在该杂志社论中把兼并取得克萨斯说成是上天的安排,即所谓的“天定命运”,美国政府在兼并取得克萨斯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顺天行事,完成自己的使命。奥沙利文说:“天定命运的权力要求我们为进行自由的伟大实验和联合自治政府的发展,而开拓和占有上帝赋予我们的整个大陆。这就是我们的要求。”^{[13] (P.144-145)}同年12月27日,《纽约早晨新闻》在评论俄勒冈争端时又一

次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并加以渲染,使得“天定命运”理论成为当时美国舆论界的焦点话题,许多美国刊物争相传播。

19世纪70年代,随着一代新人涌现,美国的“天赋使命”意识又开始在更广阔的领域里驰骋。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君主制的复辟表明旧大陆已经老朽衰颓,而年轻兴旺的美国将取而代之,以“青年美国”为标志的新“天赋使命”思潮因运而生。“青年美国”的中心思想是:美国不仅拥有丰饶的土地和无尽的资源,而且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传统,因此,美国作为“上帝的工具”,理应承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文明的“使命”。这一“使命”的最终目标是征服北美大陆以外的海洋。进入20世纪后,以北美大陆扩张为己任的“天定命运”理论逐步消失,但其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其内容开始超出了原先土地扩张的范围,涉及到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扩张,而后者恰恰是它更为重要的核心思想。美国学者普莱彻指出:“进入20世纪

后,天定命运的核心思想一旦牵涉到美国的制度,天赋使命意识便以多种形式出现:加勒比地区的‘传教士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创立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体系’的远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等都是天赋使命意识使然。^{[10] (P. 533)}

三、“天赋使命”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以自我价值观为标准的“天赋使命”意识的逻辑延伸必然是自信其优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并将领导世界,在世界事务中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这对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积极向外扩张、争当世界领袖、干涉别国内政就成为这种外交哲学理念影响的直接体现。

1. 影响之一:积极向外扩张。

我们可以将200多年来的美国外交作如下分期:

	起点	终点	特点	比重
一	1776 Independence	1803 Louisiana Purchase	孤立巩固	12%
二	1803 Louisiana Purchase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大陆扩张	20%
三	1848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1898 Declaring War against Spain	消化大陆扩张成果 & 部分海外扩张	22.2%
四	1898 Declaring War against Spain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大规模海外扩张	9.3%
五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41 Declaring War against Japan	孤立主义	9.8%
六	1941 Declaring War against Japan	2001 Present	全球扩张主义	26.7%

从上表的分期可见,对外扩张占美国外交的绝大部分,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主题。这种现象与“天赋使命”意识的熏陶和影响,关系密切。

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开始了领土扩张的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当时有一个时髦的理论能非常生动地体现美国的对外扩张思想,那即“流动的共和国”理论。该理论充分发挥了美国早期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提出的命题——“美国人一旦掌握了机会便将重新安排世界”。在“流动的共和国”的名义下,19世纪上半叶美国领土的扩张取得惊人发展,

到1848年2月与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为止,美国在短期内吞食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此,美国大规模的大陆扩张阶段基本结束。

19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海外贸易也急剧扩大。当时美国共和党创始人之一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曾任美国国务卿)扬言,美国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大陆帝国,如果把美国的商业活动与共和国理念传播到夏威夷、中国、日本、南美洲、欧洲甚至非洲去,美国将取得更加卓越的地位。”^{[14] (P. 165)}这种宣传对每个美国人都有吸引

力。这一时期,除了消化大陆扩张时期的成果外,美国开始了部分海外扩张。1854年3月,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以炮舰打开了日本门户,迫使日本签订条约,对美国开放函馆、下田两港。同年,美国迫使夏威夷签订“合并”条约。1858年6月,借助英法的力量,与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特权。1889年底,与德国瓜分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但这些海外扩张的规模与以后相比还不算大,美国的主要精力还在于消化大陆扩张时期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在北美大陆的地位。而且这种消化不是消极保守的,而是“吃着嘴里的,盯着锅里的”,在消化的同时,还主动出击,不失去一切能加强美国在北美大陆实力的扩张机会,1867年购并阿拉斯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进入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外扩张的号角开始正式吹响。以1898年开始的美西战争为标志,威廉·麦金莱总统正式揭开了美国大规模海外扩张的序幕。战争持续不到3个月,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就被击败。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与菲律宾。同年,麦金莱政府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以对列强分割中国的局面做出反应,还于1900年派遣军队去中国协同欧洲列强镇压了中国义和团运动。

当有人指责麦金莱等人的这种扩张主张时,另一位扩张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他宣称,麦金莱仅仅是在重走杰斐逊所标明的道路。他说:“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问题上所做的,同如今在菲律宾问题上所做的,同出一辙,并行不悖。每过十年,负有特殊使命的美国人就会把自由的营帐扎到更西、更南的地方去”。^{[15] (P.49)}

2. 影响之二: 争当世界领袖。

到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与欧洲大国抗衡的力量,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身价”倍增。西奥多·罗斯福虽慑于先辈的“遗训”,在外交上手脚未能完全放开,但在1904年摩洛哥危机中却迈出了卷入欧洲政治纷争的第一步。它是美国主动卷

入欧洲政治纷争的开端,也标志着美国扩大海外影响与争当世界领袖努力的开始,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说西奥多·罗斯福是唤醒美国争当世界领袖之梦的总统,那么,其后任伍德罗·威尔逊则是第一位力图把这种梦想转化成现实的美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实现这种梦想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威尔逊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动时期,对外扩张也进入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威尔逊虽以“理想主义”外交著称,但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理想”与扩张往往混淆不分,扩张依然是不变的主题。

1916年10月5日威尔逊在奥马哈讲话中说:“美国远离现在这场冲突,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战火蔓延,不是因为她不感兴趣,也不是因为她冷漠无情,而是因为她想要扮演的角色是一种不同于此的角色。”^{[16] (P.266)}言外之意,美国奉行中立政策,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中立期间纵横于交战国之间,以仲裁者的身份结束战争,以期控制国际局势,进而实现领导世界的梦想,扮演一种美国想扮演的那种角色。

美国的“调停”贯穿于中立时期,虽然无一奏效,但由这场战争唤起的争当世界领袖的梦想再也没有消失。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交战双方精疲力竭,而美国的力量愈益强大,实现世界领袖之梦的条件更加成熟。1917年4月2日,美国终于宣布站在协约国方面介入战争。威尔逊政府参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寻求实现世界领袖地位的新机会。调停是威尔逊总统力图实现其世界领袖之梦的第一种手段,当它未能奏效时,参战就成为另一种选择。虽然威尔逊政府并未不加掩饰地宣称美国参战是为了实现世界领导权,但这种思想无疑对美国参战发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也就成为美国主要的战争目标之一。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该计划充分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天赋使命”意识,是威尔逊政府在外交辞令掩饰下要求充当世界领袖的宣言,它公开了美国的具体战争目标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总构想,勾画出一幅以美

国为领袖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虽然,这个以争当世界领袖为目的的“十四点计划”在英法等欧洲老牌帝国的作梗和美国国内反对派的攻击下流产了,但它却是美国冲击世界领袖地位的第一次完整尝试,为以后美国的扩张和“作大”奠定了基础。

20多年后,威尔逊的世界领袖之梦终于在另一位民主党人手中实现了,他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基本上是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在未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为这些国家的“兵工厂”,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向欧亚两洲,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12月7日对日本正式宣战,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结束与全球扩张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美国就以全新的面孔,全力投入世界领袖地位的争夺,最终凭借其超强的实力爬上西方世界霸主的宝座,并利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击溃了另一位有世界领袖梦想的巨人——苏联,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3. 影响之三:干涉别国内政。

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和优越感加上超强的实力,其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对别国的鄙视和干涉。应该说,受“天赋使命”等外交哲学理念的影响,美国早有干涉它所认为的落后或需要帮助的国家 and 地区事务的欲望。因为美国认为只有他们的价值观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为了人类的未来,它有义务输出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其他价值观念,即使这种输出带有强制性,“也是为了最终改善落后民族和国家,并最终使落后国家和民族得益。”但是由于国家实力所限,美国虽有干预之心,而无干涉之力。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炮声的平息,美国终于依靠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国家实力,登上了西方世界霸主之宝座,拥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超强实力,并开始觊觎世界霸主地位,所以,干涉别国内政就主要发生在美国外交的全球扩张主义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美国才既有干涉别国之心,又有干涉别国之力。

“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以民族民主革命(或改革)的形式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些革命(或改革)往往打破旧体制,给旧社会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繁荣富强,完全属于民族国家的内政。对于这些革命,美国往往持反对态度,总把它们与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以“反共”为招牌,横加干涉。

除了对中国革命无端干涉外,伊朗的摩萨台政府是战后美国对美洲以外地区干涉的第一个牺牲品。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伊朗首相,在日益高涨的国内民族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对长期控制伊朗石油的外国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也“在劫难逃”。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杜勒斯的直接策划下采取措施推翻摩萨台政府。他们借口摩萨台与伊朗共产党(杜德党)阴谋推翻巴列维国王,向亲巴列维国王的势力提供钱财和武器,于1953年8月策动政变,颠覆了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发表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建议国会批准每年向中东地区提供2亿美元的援助,并允许他在这一地区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国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请求,这即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打着这一旗号,在中东地区飞扬跋扈,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先后成为美国进行干涉的对象。

“二战”后拉丁美洲变成了美国名付其实的“后院”,这一地区在美国看来并不是美苏“冷战”的世外桃源,它不仅构成对美国本土安全的威胁,而且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利益。所以,对拉美地区的任何革命,美国都全力干涉,以恢复原状。在“反共”的招牌下,包括危地马拉、古巴、圭亚那、多米尼加、智利、尼加拉瓜等美洲国家先后遭到美国的干涉。

除了以“反共”名义干涉各国内政外,美国还以“输出民主”和“人权外交”的手段干涉别国内政。

“二战”后,美国成为名付其实的西方世界领袖,为了控制“中间地带”,实现“天赋”的世界霸权,“促进和维护民主自由”及“保护人权”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以大规模“输出民主”和“人权外交”为干涉别国内政手段的做法始于肯尼迪总统时期。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战后霸业达到了顶峰。他把其政府奉行的外交政策形容为“一

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在第三世界国家大力促进所谓的“民主”和“人权”。1961年，肯尼迪政府在《对外援助法》修正案中补充规定，美国国务院必须每年向国会两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各国人权状况的翔实报告，把这个报告作为美国与别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对于那些被美国认为侵犯了“人权”的国家，美国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干涉办法。这种明显干涉别国内政的“人权报告”，自1961年开始就一直延续至今。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继承了这些做法。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把在拉美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和“改善人权”作为其外交的重要内容，为此以中断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迫使南美军人政权改变统治方式，逐渐向文人政府过渡。里根以重振美国“昔日雄风”为己任出任美国总统，力图重新塑造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把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意识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老布什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选美国总统的。1990年4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他希望成为全世界民

主变革的总统，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在西半球，老布什政府直接插手帮助组建了清一色的亲美文人政权，并试图把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引导到美国安排好的方向，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化半球”，为形成由美国主宰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奠定政治基础。在非洲，打着“民主化”的旗号，与法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四处插手非洲国家事务。在亚太地区，老布什政府大力促进“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强化正在出现的太平洋共同体的思想意识，为美国主宰亚太事务扫清障碍。克林顿政府也依然重视“民主与人权外交”的干涉作用，明确把“输出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

总之，回顾200多年的美国外交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天赋使命”意识的影响下，美国外交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积极对外扩张、争当世界领袖的“发迹”史。而且，在这种独特的“天赋使命”外交哲学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在热衷于到处扩张、到处干涉别国事务、霸气十足的同时，还显得那么“坦然自若”。

[参考文献]

- [1]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M]. Boston: Freedom Press 1986.
- [2] Walt W. Rostow. The Views from the Seventh Floor [M]. New York: Apple Press 1964.
- [3] Geir Lundestad.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Bos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Denise M. Bostdroff. The Presidenc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Policy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 [5] Sterling Johnson. Global Search and Seizure: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and International Law [M]. Sanjose: Brookfield, 1994.
- [6] Edward M. Burn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 [M]. Williamsport: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 [7] A° Decon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 New York: Brosse Press 1978.

- [8] Charles S. Olcott. The Life of William Makiley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 [9] Arthur Link. The Papers of Woodow Wilson (Vol. 29) [M]. New Jersey: Prinseton Press 1979.
- [10] Alexander De conde d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2) [M]. New York: Brooking 1978.
- [11] 小布什. 就职演说 [J]. 北京周报, 2001(2).
- [12] Maureen Henry. The Intoxication of Power: An Analysis of Civil Religion to Ideology [M]. Holland: Cross Press 1979.
- [13]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 Hopkings 1935.
- [14] George E. Baker.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M]. (Vol. 4. 1884—89) Boston: Harvard 1981.
- [15]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M]. Yale University, 1987.
- [16] Arthur Link. The Papers of Woodow Wilson (Vol 30) [M]. New Jersey: Prinseton Press, 1980.

(责任编辑 齐琳)